

# “被遗忘”的古村落保护与振兴路径探索\*

## ——以福建省康里村为例

Exploring Pathway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Forgotten” Ancient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Kangli Village in Fujian Province

张杰 洪亮 ZHANG Jie, HONG Liang

**摘要** 在乡村振兴的热潮中,仍有许多拥有优质自然环境、独特建筑空间与丰饶资源物产的古村落,因区位偏远、经济薄弱等原因被大众所遗忘。选取此类“被遗忘”的古村落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嬗变成因与空间特征;同时,以福建康里古村落为案例,探讨其保护与振兴路径:关键在于激发内生动力,尤其是乡贤等关键人物的引领作用,通过提升村民的文化认同感与保护自觉性,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利用,从而实现村落可持续发展。研究表明,基于长效精细化的弹性规划与周期性驻地回访,以社区为主体、乡贤为纽带、资源为杠杆,进而强化文化认同,是推动“被遗忘”的古村落保护与振兴的重要路径之一。

**Abstract** Amid the rural-revitalization boom, many ancient villages endowed with pristine landscapes, distinctive architecture, and abundant resources remain “forgotten” owing to remoteness and economic weakness. Taking these “forgotten” ancient villag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ir evolution and their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Using Kangli Village in Fujian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it explores pathways for its protection and revitalization.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key to revitalization hinges on stimulating endogenous forces, particularly the leading role of rural sages. By enhancing villagers’ cultural identity and conscious stewardship and by integrating natural and heritage resources, sustainable village development can be achieved.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a community-centered, rural sage-mediated, resource-leveraged pathway, underpinned by long-term adaptive planning and periodic field revisits to strengthen cultural identity, offers a vital strategy for the protec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forgotten” ancient villages.

**关键词** 古村落;乡贤;社区参与;文化认同;规划策略

**Key words** ancient villages, rural sage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cultural identity, planning strategy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26) 02-0112-08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supr.20260216

### 作者简介

张杰

华东理工大学城乡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委员

风景环境规划设计学术委员会委员

zhangjietianru@163.com

洪亮

华东理工大学城乡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主创设计师

华东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硕士研究生

### 0 引言

古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为丰富的文化与自然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经济、社会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它包括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等<sup>[1]</sup>。随着我国乡村振兴与文化复兴战略的迅速推进,诸多古村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并开启了发展之

道<sup>[2-5]</sup>。然而,依然存在大量古村落,因区位偏远、经济薄弱、文化认同不足等原因,其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的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sup>[6-8]</sup>。

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古村落,尤其是后者,多被世人所遗忘。对此,亟需探索其衰败原因、核心特征,并寻求有效的保护与活化利用路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移民文化下闽台古村落空间形态特征与营造技艺研究”(编号20BH154);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课题“三重维度下新江南水乡村落保护与振兴的‘上海范式’研究”(编号2024VJSJ030)资助。

## 1 千百年的嬗变：“被遗忘”的古村落

### 1.1 3大要素的崩塌催生了“被遗忘”的古村落

千百年来,古村落的空间稳态由宗族(及其宗法制度)、礼制与农耕3大要素耦合维系。其中,宗族以血缘氏族构建“王权不下县”的基层治理;而礼制则以“孔孟朱子理学”“三纲五常”构建起社会的道德规范及其空间等级的序列;农耕则以田地物产奠定了经济基础,并锚固村民身份<sup>[9]</sup>。

由三者共同构筑的乡土秩序却在现代社会中逐步瓦解<sup>[10]</sup>。首先,城镇化引发的人口流动、经济与社会变革,使宗族血缘网络破碎化。祠堂、族谱、族田徒具外壳,内在的文脉传承中断,凝聚力消失。其次,近现代西式教育的冲击,削弱了传统礼制的自信<sup>[11]</sup>。村落文化被视为落后且变得模糊稀缺,对传统的敬畏让位于经济与消费。最后,村落的内外交流加剧了家庭经济同质化,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在竞争中崩塌。劳动力外流、劳作艰辛等因素,也使其生产方式难以为继<sup>[12]</sup>。

因此,经济落后、设施匮乏、无人问津3大要素导致了“被遗忘”的古村落现代城镇化进程中走向衰败。

### 1.2 “被遗忘”的古村落主要特征

调研表明,“被遗忘”的古村落普遍呈现以下特征(见图1)。(1) 区位交通短板突出,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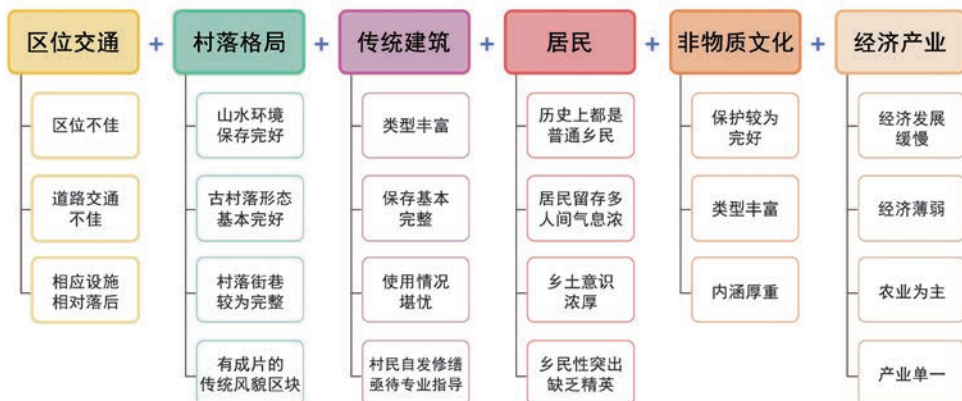


图1 “被遗忘”古村落的主要特征  
Fig.1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forgotten” ancient villages

套设施落后:区位不佳、多居于深山,对外道路交通条件差,相应的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2) 村落格局完整度高,环境基底优越:山水环境保存完好,古村落整体形态基本完好,村落街巷肌理较为完整,保留有成片的传统风貌区块,生活气息浓厚,宛若“世外桃源”。(3) 传统建筑类型丰富,保护处境堪忧:涵盖民居、宫庙、祠堂等多种类型,建筑格局保存基本完整;虽有村民自发修缮,但亟待专业指导,存在不当修缮易造成遗产破坏的情况,同时建筑使用率低,多为老人居住或空置,使用情况堪忧。(4) 居民乡土意识浓厚,社会结构简单:历史上均为普通乡民聚居,无显赫历史背景,居民留存较多、人间烟火气息浓,民风淳朴、乡土意识浓厚,乡民性突出、缺乏精英群体,村落空心化程度相对较轻。(5) 非物质文化遗产底蕴厚重,价值尚未彰显:非遗资源保护较为完好,类型丰富、文化内涵厚重,部分非遗项目仍在活态传承,但其文化价值与影响力未被充分挖掘和转化。(6) 经济产业基础薄弱,内生动力不足:村落经济发展缓慢、整体经济薄弱,产业以传统农业为主,结构单一,村级财政多依赖上级拨款,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

## 2 保护与振兴的路径探索

“被遗忘”古村落的保护振兴,其核心在于激活村民的内生动力与自发参与。古村落本质是“熟人社会”的物质映射,根植于血缘、地缘、

神缘共同铸就的信任纽带与自觉行为规范。因此,激活的关键在于:发掘并依靠村落内部的关键人物(如热心乡贤、有志青年),通过其示范引领作用,提升全体村民的文化自信与家园价值认知,从而激发村民自觉参与振兴工作<sup>[13]</sup>。

研究提出环境基底(自然与文化禀赋)、空间载体(空间资产与资源转化)与治理主体(多元行动者)3大维度的可持续策略体系,同时以规划师为代表的专业力量作为催化剂,牵动三者的有机协同(见图2)。

### 2.1 环境基底维度:保护振兴的自然根基与文化源泉

环境基底维度是古村落保护振兴的价值源泉。其独特的自然环境、物产资源与在地文化构成了古村落的核心特色与身份标识,是空间活化和产业培育的创意源泉与品牌基础。其保护与活化利用,需要治理主体在其中主导。

首先,加强精细化评估与韧性保护措施:要对村落的山水格局、生态要素及其敏感性等生态价值进行系统评估,并划定相应的保护红线;要优先采取基于自然的低技术解决方案(NbS),对村落自然环境进行生态性修复与风险管控,保护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真性与韧性。其次,推动低碳循环的资源活化利用:要基于资源禀赋的评估,相应发展低技术主导、环境友好的发展模式,要注重乡土材料、废弃材料的可持续应用,新建设施与建构物尽可能遵循小尺度、轻介入、可再生的原则,确保其可逆性。最后,开展融合自然生态的地方文化创生:要挖掘与村落山水格局适应共生的生态知识、生存智慧与山水人文叙事逻辑;要打造活态化的生态文化体验,以最小干预的方式开展有关生态的文化活动,让山水环境成为村落文化活态传承与生态低碳教育的核心场域。

### 2.2 空间载体维度:保护振兴的物质依托与活力引擎

空间载体维度是古村落保护振兴的实践场域。它既是文化、生态、社会等价值的物质载体,也是村民生活、文化传承、经济活动发生的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核心空间。对村落中历史空间的保护是发展的底线,而活化利用是激活其当代活力的关键路径,必须紧密依托环境基底维度的特色资源与文化禀赋,并服务于治理主体维度的发展需求。

首先,注重村落的整体保护与品质提升:要系统性保护村落的整体空间格局、街巷肌理、景观风貌和重要历史空间节点。对传统建筑进行安全性与风貌协调性修缮,改善包括基础设施、卫生、绿化等公共空间的环境品质。其次,开展适应性的空间活化利用: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对闲置或低效利用的传统建筑、公共空间、特色场所等空间,采取在地化、弹性化的活化模式,进一步激发空间活力。最后,促进当地特色资源的创新转化:推动村落特色物产、文化IP、生态体验等资源的产业化、品牌化与市场化,探索适合村落的可持续产业发展路径,实现空间资源的效益转化与村落经济的振兴。

### 2.3 治理主体维度:保护振兴的驱动核心与行动枢纽

治理主体维度是古村落保护振兴的核心引擎。多元主体的有效组织、共同意愿与行动能力是决定整个保护振兴工作开展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力量。缺乏这一维度,环境资源与文化价值是难以活化的,而空间也难以进行有效的运营。

首先,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建机制:将村民(基础主体)、乡贤(精神与组织引领)、村两委(基层领导与协调)、村干部(执行落实)、志愿者(辅助力量)、在地经营者(村镇企业者等经济动能)、地方管理者(政策与资源支持)等关键角色进行整合,建立权责清晰、渠道畅通的协同决策与行动机制,例如开展多主体参与的联席会、专项工作组、合作联社等。其次,强化村落自我造血的能力建设:通过乡土文化教育、专业技能培训、榜样示范与激励政策等措施,提升当地村民的文化认同感、保护自觉性、经营参与能力和发展信心,使其真正成为村落保护振兴的主人翁和受益主体。

### 2.4 专业力量的赋能协同:串联3大维度的桥梁与催化剂

专业力量是古村落保护振兴三维体系的赋能杠杆:其引导协作、知识传递和资源链接的能力,是优化环境基底的资源转化、保障空间载体的活化实效和带动治理主体的认知行动提升的关键催化剂。

首先,践行扎根乡土的专业服务态度和工作实践机制:规划师等专业力量应当长期深入村落,开展持续性、在地性的调研观察与规划工作。其次,做好知识的输入、吸收、整合与引导工作:对规划师而言,其核心职责之一是帮助村民认知村落价值,并明确自身的发展目标;同时,提供村落保护振兴的专业技术支持与创新解决方案,促进内外部知识、技术、资源的有效对接,与村民共同探索更加公平、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转化与收益分配机制。专业力量不是村落保护振兴的输血者,而是赋能者、协作者、引导者与服务提供者。

由此,治理主体依托其主观能动性,识

别、保护和利用环境基底的独特价值,并通过适应性的空间活化来实现保护与发展目标。这3个维度相互依存、相互赋能,共同构成了“被遗忘”古村落可持续发展的有机整体。而专业力量则通过知识的引导,促进三者高效协同,最终形成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见图3)。

## 3 多维共建:康里古村落保护与振兴实践

### 3.1 隐入尘烟的康里古村落

康里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的东部山区。东邻霍童古镇,古田至霍童的茶盐古道穿村而过。全村平均海拔760 m。古村落于2019年成功入选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康里村(古称“翠峰”)历史悠久,唐代已有人居。郑氏始祖于北宋宣和年间(1120年)迁入,并于元至元六年(1340年)定居现址。村落为郑氏单姓宗族聚落(“三百余家一姓通”)。现有常住人口约1105人,传统建筑119座(以清代为主,111座),建筑泥塑、木雕颇具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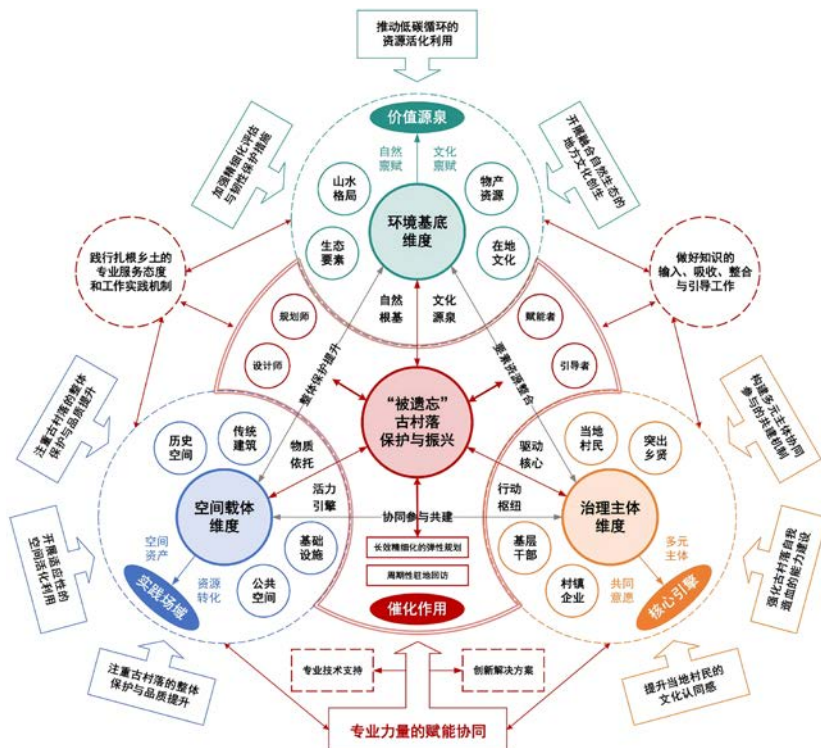


图2 “被遗忘”古村落保护与振兴策略的三维体系  
Fig.2 Three-dimensional system of “forgotten” ancient villages’ protection and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色(见图4-图5,表1)。

### 3.2 价值认知:康里古村落的资源禀赋

系统性认知古村落价值是保护振兴及提升村民文化自信的基础。对康里村价值的认知,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地方史志、谱牒、碑刻)、深度访谈(长者、乡贤、专家)与实地考察(重点建筑如郑公祠、书院、古厝等)等方法。

#### 3.2.1 千年茶盐古道的海丝驿站

唐宋以来,康里因地处古田至宁德霍童的茶盐古道(从南部入村形成“玉带路”)而商贸繁荣,沿路设有数十家客棧、商店。它承转闽北的茶叶、丝绸等物产,经三都澳港远销日韩等国;同时输入日韩香料、海货等,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北线的重要枢纽,紧密联系古田、屏南、宁德并通达东北亚。

因此,康里是千年茶盐古道上重要的商贸集散之地,也是古道与海上丝绸之路北段串联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民间古道及其古道沿线聚落发展的珍稀活本。

#### 3.2.2 南北文化交融的珍存范本

康里古村落以郑氏大宗祠为核心,以玉带路为枢纽,连接村中水井坪弄、下厝弄、后门厝弄、湖乾头弄和后宫后弄5条巷弄,将全村100多座民房、商铺、公共建筑,400多户、人口近2000人的郑氏家族维系在一起。其价值具体通过建筑遗存与民俗文化加以体现。

##### (1) 建筑遗存

在建造年代上,村落民居多建于清代,少量建于20世纪50年代。在平面形态上,因地形的影响形成了丰富的平面形态,包括规则与不规则合院以及排屋式民居群,如鉴湖联排民居,多数具有闽东民居的特色。在材料结构上,以夯土墙与木构架为主,地面为三合土加长条石砣,插梁式与檩梁式结构并用,部分民居木构与墙间留有宽60 cm巷道,实现围护与承重分离,融合了闽东福州、福安的建筑特点<sup>[4]</sup>。在建筑立面上,采用高大封闭的墙体与多元风火墙形式。建筑入口处较为简洁,仅做

披檐与朴素的石刻装饰,两侧墙体高大,多在10 m左右。侧立面多采用五叠式、观音兜式、围合式风火墙等形式,与闽北、福安以及浙北民居建筑类似<sup>[15]</sup>。在装饰艺术上,窗饰以槛窗、阑槛钩窗为主,多刻有图案或文字;墙饰

则集中在入口大门风火墙部位,多采用精美艳丽的灰塑、泥塑;柱础石有圆形和方形,带有美观大方的石雕;门框则可见石、砖、木3种材质,其中石与砖材门框纹样简洁朴实,常与门墩、门限结合雕刻松鹤、竹鹿、对联等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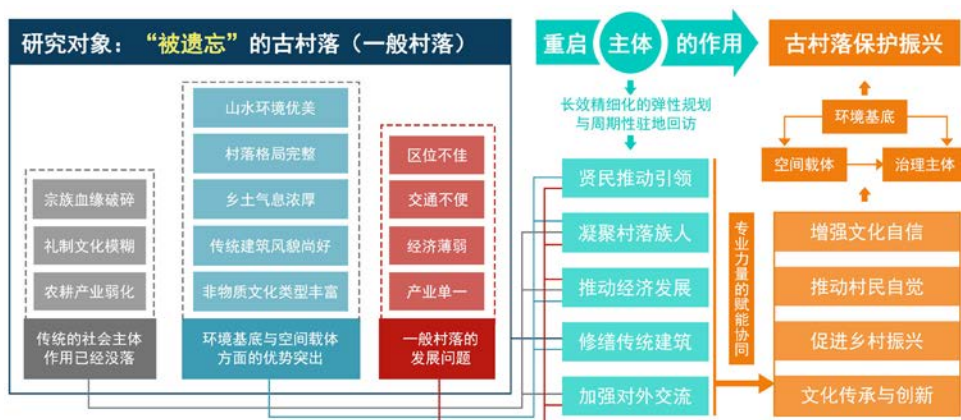


图3 “被遗忘”的古村落治理主体引领下的活化逻辑

Fig.3 The revitalization logic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forgotten” ancient villages’ governance subjec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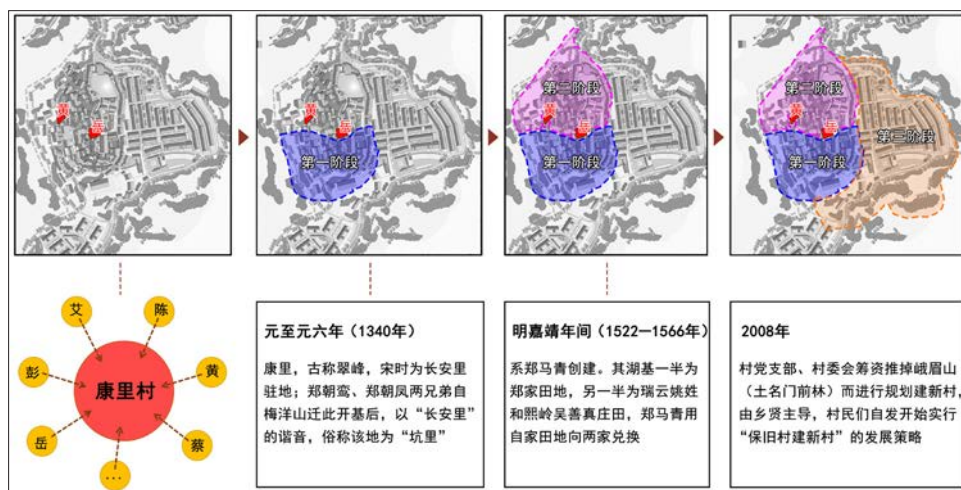


图4 康里村落空间演变历程

Fig.4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Kangli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康里鸟瞰、街巷与局部建筑群

Fig.5 Kangli Village's bird's-eye view, streets and alleys, and local building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整体而言,其装饰虽较福州民居简朴,但色彩较闽北、福安地区明艳,同时融入了闽南水车堵泥塑与彩绘风格元素,呈现出独特的地域特色(见图6-图7)。

(2) 民俗文化

康里至今留存着丰富的民俗文化,涵盖戏曲、手工艺、武术、酿酒及各类祭祀活动等。其中,平讲戏是最具代表性的康里民俗之一。它是明末清初由民间“驮故事”(亦称“肩头棚”)表演艺术融合发展而成的高腔剧种,曾广泛流行于福州、福安一带,清嘉庆至道光年间,屏南平讲戏日趋成熟,自清咸丰至民国中期的七十余年,康里平讲戏更是步入鼎盛发展阶段。

3.2.3 高山仙居的得道之所

康里村位于道教“三十六洞天”之首的霍桐山中。其选址深合风水理念:背靠髻山(西),面朝峨眉山(东),南有福山、财山护围,北有牛斗岗、关山岗屏障,村落坐落于西南高、北向低的“八卦形”坡地,水向西北流出;村内陈头坪、黄厝岗两小山拱卫祠堂两侧。

明代洪武年间(1390年后),郑氏兴盛,拓展形成了“玉带路”并环绕全村落,构建了以西南“郑氏宗祠”和东北“鉴湖”为阴阳双核的八卦格局。设置5处水井/槽(“水井坪”“下厝弄”“后门厝”“前厝角”“宫后弄”)以方便村民的生产生活,并强化空间意象,结合周山形胜,最终形成了“玉蚌含珠”的村落空间形态(见图8)。同时,康里村坐拥高山之巅的优质生态环境(空气清新、植被茂盛),盛产金银花、黄柏、阴地蕨等中草药,契合霍童道家炼丹养生的需求。综上,康里村的聚落格局、建筑形制与周边自然生态共同印证了独特的山地生态与深厚的道教文化背景。

3.3 空间规划:康里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引导

3.3.1 总体定位与发展策略

研究发现,康里作为闽东南、闽东北交汇之处的传统村落,其历史悠久、村落格局独特,遗存类型丰富且保存较好,科学艺术价值较高,文化底蕴厚重,真实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

的特征,对于研究茶盐古道、道教文化、红色革命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为古村落的保护振兴奠定了资源基础。基于其价值与现状,规划将其定位为:依托特色文化、自然山水,建设宜居宜乐的生态型山野传统村落,重点发展特色文旅。产业上以特色旅游为核心,联动特色

化、现代化农林产业,打造代溪镇东部旅游发展区。功能上聚焦乡村旅游与生态休闲农业。形象上塑造“古道研学驿站、海丝康养之地、文旅体验营地”的品牌。

3.3.2 保护与发展的总体策略

保护上,强调“保、控、禁、引”相结合的

表1 康里古村落变迁历程  
Tab.1 Evolution of Kangli Village

阶段	村落形态	历史遗存
唐开元二十九年 及以前	村落内已有住户。境内有艾、郑、岳、吴、陈、黄、杨等姓氏在此定居	古厝基等
宋元时期	郑氏始祖于元至元六年迁今址开基	龙井桥、郑氏大宗祠
明清时期	茶盐古道发展,商贾穿村而过,形成了商业街区。而村落则以祠堂为中心形成八卦形的空间形态	翠峰书院、郑尔旭厝、郑才瑚厝等古厝
民国时期	康里作为革命根据地,形态基本保留	古村落
1949年之后	村落向东部发展,形成新村与旧村共融的形态	新村旧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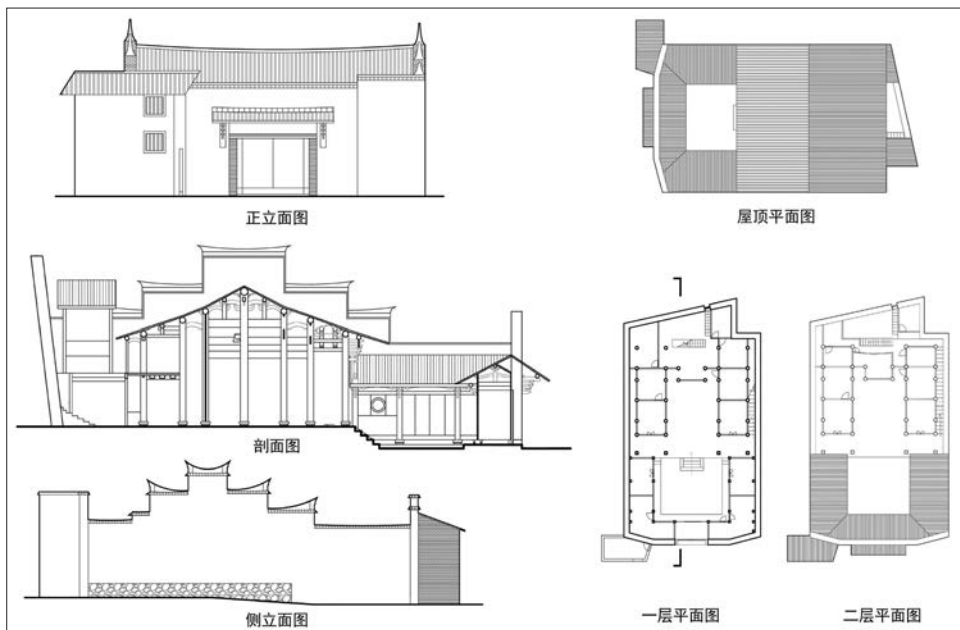


图6 康里村民居测绘图  
Fig.6 Kangli Village's residential survey and mapp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康里村民居建筑的山墙、吊桶与灰塑  
Fig.7 Gables, hanging buckets and plaster sculptures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Kangli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策略。“保”——保护整个古村落,维系村落空间肌理与街巷格局,保护历史建筑与历史环境,整治古村落环境。“控”——控制古村落中东北梯田、林地的建设。“禁”——为确保古村落的安全,划定古村落西北部、髻山东南麓500 m范围内为地质灾害整治区。在此区域内,严禁建设行为和村庄向西北发展,以维系现状梯田和林地格局。“引”——引导新村向西南发展,引导新村居民在自建房屋的过程中,采用传统风貌的建筑形式与建筑符号、材料,引导自建房屋朝着集约、节能、环保的方向发展(见图9)。

发展规划强调“文化展示”与“三苑建设”的双核策略。文化展示上,在保护古村落的基础上,围绕茶盐古道文化打造宜居宜乐的生态田园村落。三苑建设上,主要包括古道驿站苑:改造村委会原址及前广场为“大门间”式旅游集散中心(含集散大楼、停车场/广场),彰显茶盐古道特色;宗祠翠峰书院:整合郑氏大宗祠、翠峰书院及北段商业街,形成翠峰广场,打造集展览、民俗、民宿、戏曲、商贸于一体的宗族与书院文化综合体;鉴湖快乐家园:围绕鉴湖,融合鉴湖排屋、举人厝、郑公祠、特色民宅及海丝商业街,创建集商贸、茶室、民俗、小吃于一体的休闲娱乐核心区。

### 3.3.3 总体布局

规划形成“一带、双环、三心、四片、五节点”的空间结构。“一带”:新村与古村间的绿色景观带。“双环”:外环(联系环)——后

山路与康里路,环联新村与古村;内环(风貌环)——玉带路(打造为茶盐古道海丝风貌街)。“三心”:3大功能核心——古道驿站苑、宗祠翠峰书院、鉴湖快乐家园。“四片”:研学文旅区、海丝商贸区、养生悟道区、百姓人家区。“五节点”:红色展示馆(郑福旺宅)、武术体验馆(武秀才厝)、水尾景观节点(北门)、西门古道节点(门间,近郑春风宅)、南门古道节点(小学东门)(见图10)。

### 3.4 内生激活:社区参与和文化自觉

康里古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编制为村落发展指明了方向,但资金匮乏、村民参与度低,缺乏领头人带领,缺乏管理引导等因素,使村落的保护发展依旧步履艰难。解决其发展困境的突破点在于发掘并依靠村内“乡贤”,并有效发挥其引领作用。

规划团队通过长期驻扎乡村,开展规划编制工作。该过程并非简单的短期考察或点状介入,而是采取了系统化、沉浸式的驻扎策略,这对于深入了解康里古村落的村情民意以及精准识别潜在乡贤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团队建立了康里古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站,并实现了生活化的融入。核心编制工作人员基于村集体闲置房屋设立长期工作站,实现了与康里村民共同吃住的生活体验,一方面降低了往返调研的沟通成本,另一方面通过日常的田间闲聊、民俗参与等,自然地融入村民的社会网络体系。通过观察村民

的真实互动与潜在矛盾,为后续规划编制工作奠定更加深厚的信任基础。

其次,团队实施滚动式调研与动态编制档案的多阶段更新。驻扎工作期间,不同于“一次性普查”思路,团队采用了周期性、多轮次的深度调研工作流程。初期阶段主要通过空间踏勘、问询走访、集体座谈等方式,建立基于康里村的基础数据库。后期主要开展定期的专题小组研讨,并针对村内的关键人物进行深度访谈和日常观察,持续完善初期未能涉及的隐性内容。

再次,推行参与式规划工作坊的常态化实践。规划团队通过在村内的日常公共空间中设立小型工作坊,开展形式灵活、主题明确的研讨活动。工作坊设立地点包括村民家中、宗祠、晒谷坪甚至小卖铺门口,议题多元开放,从单条巷道的修缮到如何发展康里村的文旅产业,鼓励村民围绕具体的小问题进行实质性、低门槛的讨论和实践尝试,并从该过程中发掘乐于奉献的潜在乡贤。

最终,在较为漫长的规划编制中,发现一位村民郑先生极具“乡贤”的特质,通过编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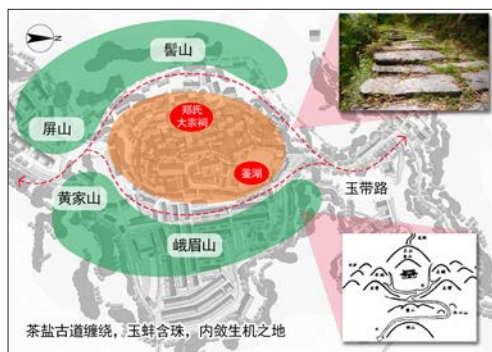


图8 “玉蚌含珠”的村落空间形态  
Fig.8 A spatial morphology of “jade clam embracing a pearl”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康里“保、控、禁、引”相结合示意图  
Fig.9 “Protection, control, prohibition, and guidance” in Kangli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0 总体规划布局与规划总平面  
Fig.10 The overall layout and plan of Kangli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团队与“乡贤”的共同努力,探索了由村民自觉主导村落保护振兴的发展路径。

### 3.4.1 创新文化形式,推动文化自信建设

依托传统“月四节”,规划团队与乡贤郑先生共同创新,成功举办了端午祭祀巡游活动。村民身着汉服,抬神像、举旗幡、奏鼓乐,沿玉带路经祠堂、书院、门间环鉴湖巡游,最终在湖心祭台举行典礼。基于此,郑先生创新性地发明了“旱地龙舟”,突破了村落无河的限制,拓展了非遗传承新形式,丰富了村民生活,并有效增强了文化自信。

### 3.4.2 加强对外交流,增强村民文化自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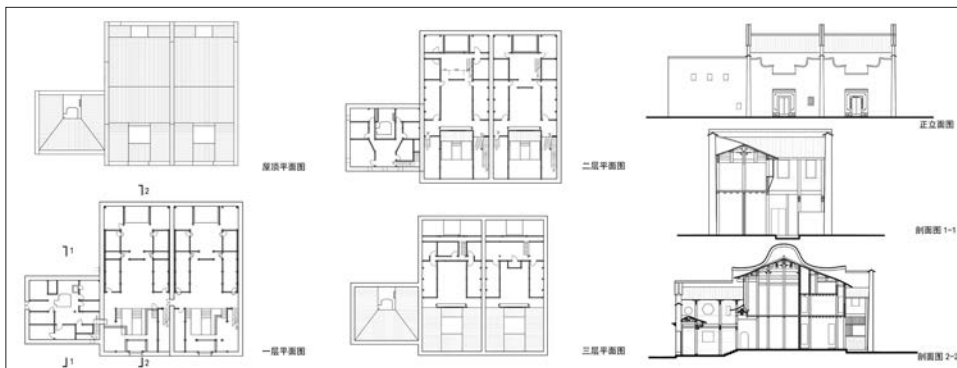
在郑先生的推动下,康里村委成立“翠峰北路椰子戏剧团”,挖掘整理地方戏曲,并多次参与对外交流,宣传传统文化。同时,通过举办民俗文化节、康里“春晚”、中美及两岸大学生夏令营等活动,活化非遗、扩大影响力。由村民主导参与的活动聚集了人气,使村民获益并有效提升了文化自信。

### 3.4.3 社区力量主导,自发修缮活化遗产

20世纪90年代末,在郑先生的推动下,康里确立了“保护古村、发展新村”理念,形成了“东南新村、西北古村”格局。这一社区自发决策为古村历史文脉的完整保留奠定了基础。随着文化认同的增强,村民开始自觉参与文物保护,近年来已自发开展龙井廊桥、研学中心、大礼堂、茶盐古道凉亭等多处建筑的修缮工作,显著推动了古村保护工作。

其中,翠峰书院作为典型案例,很好地诠释了乡贤牵头募集资金、村民自发参与修缮的良性模式。翠峰书院创办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书院坐西朝东,占地面积640 m<sup>2</sup>,其破损严重,出现梁柱开裂、屋架弯斜、虫蛀渗水、屋顶塌陷、墙体变形等情况。为此,由乡贤牵头,经设计单位与郑先生的协同努力,募集近50万元资金,成功组织村民自发修缮(见图11)。

在乡贤郑先生的推动下,修复后的建筑已焕发新生:翠峰书院成为妇女编织手作与日常聚会的活力空间;研学中心兼具研学与民宿功能;大礼堂承载文化演出、宴席与休闲活动。



a 翠峰书院的平面、立面与剖面图



b 修缮后的翠峰书院

图11 翠峰书院的修缮

Fig.11 The renovation of Cui Feng Academ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自摄。

康里的实践充分证明:乡贤的有效组织与持续推动能显著提升村民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激发其保护振兴古村的内生动力和自觉行动,是实现康里空间规划实施与文化遗产可持续活化的关键保障。

## 4 结论

“被遗忘”的古村落是传统社会结构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日渐瓦解的空间产物。在当下乡村振兴、留住乡愁和文化复兴的多元时代语境下,亟待开展此类村落的保护与振兴研究探索。福建康里古村落的保护与振兴实践,为破解此类困境提供了一定启示:首先是价值唤醒,需系统提炼并传播村落生态与文化价值,重塑认同;其次是激活乡贤,以文化活动将“旁观者”转为“守护者”,并培育公益型乡村人才,以弥补规划者的缺位;同时,创立共生机制,规划需扎根古村落,精准把控,以破解其发展痛点。

因此,其关键路径在于:以社区为主体,通过强化文化认同和激发内生动力,充分发挥村内关键人物的引领作用。同时,在科学的规划引导下,有效整合利用好当地自然与文化资

源,开展精细化、持续化、深入化的规划编制与实施工作,探索符合其自身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以社区为核心、乡贤为纽带、资源为杠杆、持续规划为保障,方能使“被遗忘”的古村落活态新生。■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胡燕,陈晨,曹玮,等. 传统村落的概念和文化内涵[J]. 城市发展研究, 2014(1): 10-13.  
HU Yan, CHEN Sheng, CAO Wei, et al. The concept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4(1): 10-13.
- [2] 唐劼,周俭.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侨乡传统村落可持续保护传承路径与实践——以中山市为例[J]. 上海城市规划, 2024(6): 94-102.  
TANG Jie, ZHOU Jian. Path and practice of sustainabl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hometown of overseas Chine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Zhongshan[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24(6): 94-102.

- [3] 秦芳,陈耀华,李路平. 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的适应性治理策略——以普洱景迈山传统村落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23 (4): 105-113.  
QIN Fang, CHEN Yaohua, LI Luping. Adaptive governance strategi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of Jingmai Mountain in Pu'er as an example[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3(4): 105-113.
- [4] 谢辉,朱颖,罗俊,等. 基于四素同构的哈尼族传统村落声景特征及保护策略——以阿者科为例[J]. 中国园林, 2024 (4): 116-122.  
XIE Hui, ZHU Ying, LUO Jun, et al. Soundscape features and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of Hani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four-fold system: a case study in Azheke[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4(4): 116-122.
- [5] 顾大治,吴金辉,杨震雯.“文—旅”空间耦合协同度对游客文化遗产保护行为影响研究——以徽州传统村落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24 (3): 31-38.  
GU Dazhi, WU Jinhui, YANG Zhenwen.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ultural space and tourism space coupling synergy on tourist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behavior: a case study of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24(3): 31-38.
- [6] 李雅馨,朱晓明. 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登高古村[J]. 城市规划, 2023 (2): 77-78.  
LI Yaxin, ZHU Xiaoming. Denggao Ancient Village, Pujiang County, Jinhua City, Zhejiang Province[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3(2): 77-78.
- [7] 李红艳,葛亮.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灵泉古村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历史街区调研[J]. 城市规划, 2024 (6): 125-126.  
LI Hongyan, GE Liang. Investigation of the historical block of the nation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research center of Lingquan Ancient Village, Heyang County, Weinan City, Shaanxi Province[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4(6): 125-126.
- [8] 孙九霞. 乡村旅游视域下传统村落的主体性消解与重构[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3): 119-128.  
SUN Jiuxia. The diss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tourism[J]. Journal of Hubei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24(3): 119-128.
- [9] 张杰,庞骏,蔡宇超. 消费时代下文化遗产保护之乡愁“情”“殇”——兼论城乡文化遗产的“道”“器”创想[J]. 城市发展研究, 2023 (4): 88-97.  
ZHANG Jie, PANG Jun, CAI Yuchao. Nostalgia “feeling” and “mourning” of the acti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 the era of consumption: on the creation of “theory” and “tool” of urban and rural cultural heritage[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3(4): 88-97.
- [10] 朱磊. 传统村落风貌保护与发展中的山水画境重塑——以安徽省祁门县桃源村为例[J]. 上海城市规划, 2023 (5): 57-64.  
ZHU Lei. Landscape painting reconstruction i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features: a case study of Taoyuan Village in Qimen County, Anhui Province[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23(5): 57-64.
- [11] 姚佳昌,王金平. 村落遗产的价值认知与保护发展反思[J]. 文化遗产, 2022 (5): 143-150.  
YAO Jiachang, WANG Jinping. Reflections on the value cognition, safeguarding and development of village heritage[J]. Cultural Heritage, 2022(5): 143-150.
- [12] 费雪艳,程叶青,罗柳莎,等. 空间商品化视角下传统渔村文化景观基因变异过程与机制研究——以海南省崖家渔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24 (10): 2744-2762.  
FEI Xueyan, CHENG Yeqing, LUO Liusha, et al. Study on the varia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cultural landscape gene in traditional fishing vill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commerci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Tanka Fishing Village in Hainan Provi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4(10): 2744-2762.
- [13] 徐瑾,万涛. 由“村外人”到“新乡贤”的乡村治理新模式——以H省G村为例[J]. 城市规划, 2017 (12): 65-72.  
XU Jin, WAN Tao. Outsiders-to-rural elites-based rural governance model: a case study of G Village, H Province[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7(12): 65-72.
- [14] 周易知. 闽系核心区风土建筑的谱系构成及其分布、演变规律[J]. 建筑遗产, 2019 (1): 1-11.  
ZHOU Yizhi. Pedigree of min-style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in Fujian Province: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J]. Heritage Architecture, 2019(1): 1-11.
- [15] 刘伟琦. 自组织理论视角下浙北山地型聚落空间特征及其更新策略[D]. 杭州: 浙江大学, 2022.  
LIU Weiqi. Research on spatial form and renewal strategies of mountainous settlements in north Zhejiang Province based on self-organization theory[D].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2022.